

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派诗学”研究

——读曹万生著《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

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诗派”和“现代派诗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曹万生先生著《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厚实的材料和深刻的理论研究而具有开拓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收获。它一方面加强了中国现代派研究的某些结论,另一方面又以其新的发现对过去研究中的某些错误、忽略和含混有所纠偏,同时还对30年代“现代诗派”的一些现象进行了新的理论上的解释。

《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在研究上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比较研究,主要是“比较诗学”中的“影响”研究。我认为,从影响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派诗学”是深得要害的,这是因为,“现代诗派”是典型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它的形成,首先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其次与中国传统的意象诗歌及其诗论有密切的关系,再次才是继承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和新月派的传统。过去我们特别强调时代的因素和现代主义的传统对“现代诗派”的影响,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它们对于“现代诗派”的形成不具有根本性影响。“现代派诗学”从根本上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和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在某些方面的契合。所以,对于“现代派诗学”的研究,中西比较和影响研究才是关键。而这也正是本书的特色。在“导言”中,作者说:“要彻底研究现代派诗学就必须研究它与中西诗学的关系,研究现代派诗学的内在构造,研究它对上述诗学各自的借鉴、扬弃、超越。”(第11页)这是深中肯綮的,这一思想事实上也始终贯穿在全书的研究中。

通读全书,我们看到,现代派诗学的本体研究显然是本书的重心,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现代派诗学”术语、概念和范畴的清理上。对每一个具体的诗学概念、范畴,作者都对它的西方诗学来源、中国古典诗论来源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梳

理。更重要的是,作者不仅注重考察和梳理这些术语、概念和范畴的中西方源流,更注重考察和研究它们在中国“现代派诗学”建构过程中的歧变、衍生和发展,因为中国“现代派诗学”正是在这种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和西方诗学理论的歧变、衍生和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比如关于“象征”,作者首先从历史层面上介绍它是如何引入中国的,在引入之后,朱光潜、梁宗岱等如何借用中国古代的“比”、“兴”对它进行改造,然后再在理论层面上分析“现代诗派”对它的理解与应用。再比如关于“意象”,作者首先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对西方意象理论的引入过程,特别介绍“现代派”对它的引入过程,并研究它在中国的变异,然后介绍中国古代诗学关于意象的内涵、形态和功能,并研究中国“现代派诗学”是如何改造古典意象理论从而“为我所用”的。

对于具体的概念、范畴作者是这样研究,对于具体的理论作者也是这样研究的。比如“纯诗”理论,作者首先介绍“现代派”对西方纯诗理论的引进,特别介绍西方纯诗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差异性,然后介绍“现代派”对晚唐、南宋“纯诗”理论的借鉴及其重新理解,最后研究“现代派诗学”对纯诗理论的发展和变异。这里,作者显然是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来研究纯诗问题,正是“比较意识”把中国古代的“纯诗”理论和西方的纯诗理论联系起来,也正是“比较意识”建构了中国“现代派诗学”的纯诗理论。我们看到,30年代中国“现代派”重新重视晚唐和南宋的“纯诗”理论,显然是以西方纯诗理论作为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的,但也正是这种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派”对于中国古代“纯诗”理论的重新阐释,这样,在中国“现代派诗学”那里,中国古代“纯诗”理论就具有了西化的特征。

反过来,西方的纯诗理论之所以能够输入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同,这其实与纯诗的“中国经验”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纯诗创作特别是晚唐和南宋的“纯

收稿日期:2004-11-01

作者简介:高玉(1964—),男,湖北荆门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诗”理论为我们接受西方的纯诗理论奠定了实践和心理的基础。西方的纯诗理论是一种异域文化,它输入中国之后,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成长,必须要有相应的土壤,而中国古代的“纯诗”和“纯诗”理论正好契合了这种异域的文化,所以它最后能够得到中国文学的接受。在这里,“现代派”把中国古代的“纯诗”理论和西方的纯诗理论相提并论,其实也是一种论证策略。事实上,我认为,中国古代的“纯诗”和“纯诗”理论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它和西方的纯诗和纯诗理论具有实质性的区别(所以,本文中凡提到中国古代纯诗和纯诗理论时,都加引号,以示区别)。

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关于纯诗的“陈见”和“知识”又影响了“现代派诗学”对西方纯诗理论的输入和引进,我们总是站在已有知识基础上,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来理解西方的纯诗理论,这样,西方的纯诗理论在输入的过程又发生了另一重的变异,即变得中国古文化。事实上,中国“现代派诗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双重的变异中建构起来的。对于中国古代的“纯诗”理论,我们误解了;对于西方的纯诗理论,我们也误解了。但是,这种误解在中国“现代派诗学”的建构过程中恰恰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双重的误解中中国“现代派诗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传统,而是第三种理论,即中国“现代派诗学”。作者说:“现代派的审美特质在于,它是古典意境与现代意识的统一,是中国历史沉淀的审美情趣与西方现代主义审美倾向的统一。这些统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价值无法定向的现实基础上,得到了结合。按照中国古典的定义来看,它是现代主义的;按照西方的定义来看,它是准现代主义的。”(第100页)作者用“偶合”这一词来描述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形成,我认为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中国“现代派诗学”的形成,一方面有某种自觉性,另一方面也包含着某种历史性误解,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派诗学”对西方和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借鉴、改造、扬弃和发展,一方面具有自觉性,另一方面也是文化语境使然。这是我对作者所说的“变异”的基本理解,鉴于这种理解,我认为作者关于“变异”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在过去一般的“中国现代派文学”、“现代主义诗学”和“新诗史”研究中,30年代“现代诗派”人员上基本就是以《现代》和《新诗》为阵地的诗人群体,其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材料也主要限于这两个杂志。但作者对当时的期刊重新披览和仔细分辨后发现,“现代诗派”的诗人阵营远比这庞大,诗歌的数量远比这丰富,诗歌创作的特点也远比这复杂。作者考察,“现代诗派”并不是在《现代》才开始的,《新文艺》可以说是“现代诗派”的“滥觞阶段”,因为《新文艺》的诗作已经显示出现代派的倾向,只是作为流派还未定型。《现代》和《新诗》可以说是“现代诗派”的“大本营”,除此之外,《水星》、《大

公报·文艺·诗特刊》、《北平晨报·诗与批评》、《文学季刊》也是非常重要的阵地。另外,《现代诗风》、《星火》、《今代文艺》、《文艺月刊》、《菜花》、《诗志》、《小雅》等杂志也与“现代诗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现代诗派”的形成和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特别是对《大公报·文艺·诗特刊》和《北平晨报·诗与批评》这两家刊物,作者作了“发掘式”或“考古式”的重新研究。作者发现,《大公报·文艺·诗特刊》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有很大影响的现代派诗刊,是《现代》和《新诗》的桥梁,是“现代诗派”的重要阵地,“现代诗派”很多重要理论文章都是在这里发表的。长期以来,这个刊物几乎被学界遗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更重要的是,这种缺失严重影响了我们对于“现代派诗学”的理解和研究。同样,《北平晨报·诗与批评》也是一家很重要的文学刊物,当代学者中,孙玉石先生最早将其列入现代派诗刊,但学术界并没有对这个杂志进行系统的研究,作者在本书的“资料篇”中对这个杂志进行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清理,作者发现,作为“现代诗派”重要成员的曹葆华不仅积极介绍法国象征派的诗歌理论,同时还在《诗与批评》上大量介绍英美“新批评”的批评理论,这使我们看到了“现代派诗学”的另一面,对“现代诗派”有了新的认识。

除了这种资料上的发现以外,《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一书还有很多有关“现代派诗学”和“现代”诗派文学史实和理论上的发现,比如“现代诗派”与西方未来派、立体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戴望舒与魏尔伦、古尔蒙、保尔·福尔、耶麦、艾吕雅、苏佩维艾尔、瓦莱里、阿波里奈尔之间的关系,卞之琳与波德莱尔、魏尔伦、艾略特、叶芝、里尔克、瓦莱里、奥登、阿拉贡之间的关系。理论上,作者对“现代派诗学”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象征”、“意象”、“知性”、“纯诗”、“音乐”、“格律”、“契合”、“比”、“兴”、“妙悟”等都作了重新的清理,这些清理,有些是前人和别人已经做过的,有些则是作者的首次尝试。对于前人和别人已经做过的研究,作者一方面充分吸收前人和别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大胆地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不失为一家之言,具有建设性。

总之,《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它是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派诗学”比较研究的专题性著作,但同时也具有方法论意义,对于其它流派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对于当代诗学理论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对现代派史实的发现与研究,具有文献学的意义。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瑕疵,比如,我认为,“第三编”的“批评”部分缺乏应有的展开,再比如,把借鉴和承继中国古代文论也称作“引入”,容易在字面上引起某种误解,称为“现代转化”,或“现代阐释”为好。